

中國近代官僚資本的實質 及其與民族資本的區別

祁 濤

我們知道，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什麼是官僚資本呢？毛澤東同志指出：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①又指出：“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並為他們所豢養的階級。因此，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歷來都是革命的對象”。^②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又作了進一步分析。明確指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着，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城市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作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作官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任務，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③毛澤東同志的這些科學論證，不但指出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產生的社會根源，而且还指出官僚資本具有的基本特徵：首先，是與國家政權直接結合在一起的，構成了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壟斷着全國經濟命脈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其次，是與帝國主義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具有濃厚買辦性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三，是與本國地主和舊式富農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具有濃厚封建性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四，是直接壓迫廣大勞動人民，民族資產階級，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具有極端腐朽性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概括說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具有四個基本特徵：壟斷性、買辦性、封建性、腐朽性。其中壟斷性和腐朽性是一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所共有的特徵。只有其餘兩個特徵才是中國近代官僚資本所特有的。可見，中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不完全相同的，它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影響下的半殖民地制度和半封建制度的混合物，是資本主義性質和半封建性質的混血兒。這個獨特的經濟現象，只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下才會出現。

①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46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74頁。

③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53頁。

中国近代官僚资本从其产生之初就程度不同的具备了上述的一些特征。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企业，不同个人，其表现形式和程度都是不完全相同的。我们知道，清末官僚资本的封建性比较浓厚，但李鴻章、盛宣怀和张之洞、蔡锡勇相比，前者具有更多的买办性，后者则表现为更多的封建性。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虽然表现为更多的买办性，其买办化程度是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本所不及的，但是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在抗战前，较多发挥其强烈的买办性；在抗战期间，特别是战末几年，则是更多的发挥封建性；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实际上已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买办化程度已达到了极高峰，已变成殖民地资本，直接构成了美国在华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强烈的买办性表现在四大家族各个成员身上也不完全一样。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和宋子文相比，前者具有较多的封建性，后者则从政治到经济，从业务到生活，几乎完全买办化了。有人说：宋子文“做的美国事，住的美式房，吃的美式饭，穿的美式衣”，“他日常讲的是英文，写的是英文，看的也是英文，中文文件是必须先译成英文然后过目的。他简直是一个皮肤黄色的美国人罢了”。^①

从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的统一体的近代官僚资本来看，不论是清末官僚资本或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期官僚资本都是反动的，都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所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但是官僚资本的不同特征，对其经济活动的影响说来是不一样的。例如，买办性强的企业和封建性强的企业相比，其发展趋势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封建性是表现为封建关系对资本主义性质大机器工业的束缚，它是企业资本主义经营的消极因素。因此，封建性比较强的企业，当其资本主义经营因素增长还没有突破封建关系的束缚，反而被其窒息时，其企业经营往往是走向失败道路。清末许多官办工业的失败就是明显的例子。买办性和封建性不同，它是表现为半殖民地国家大机器工业与外国资本不平等的经济依附关系，它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大机器工业本身没有对抗性矛盾。企业买办性的不断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制企业中的某些封建关系对大机器生产的束缚，因为这种束缚是不利于外国资本的侵入的。在为了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外国资本可能帮助它确立起附庸性质的资本主义关系，使它走向买办化的道路。这样，买办性强的企业就可能获得存在和发展，清末大买办盛宣怀等人和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经营的许多企业，在帝国主义直接羽翼下一直存在和发展就是例子。但是，官僚资本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又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当企业由于封建关系而被利用来作为取得政治权势的手段时，官僚资本家就极力要求强化企业的买办性，企图借助于外国资本势力保障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为了防止自己政治势力一旦失势仍能保持其官僚资本企业，从而保证再获得政治地位的可能，也要求不断地强化企业的买办性。可见，官僚资本具有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是相互联系的，不能把它孤立起来。

一般说来，抽象的探讨官僚资本含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具体到某些企业是否是官僚资本就成为比较复杂的问题。例如，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民生公司、中兴煤矿公司、大生纱厂等企业的性质，在学术界中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些企业是官僚资本，也有些人认为这些企业是民族资本。例如，通州大生纱厂是张謇在1895年创办的（其后又创办有二、三厂和第一分厂）。在设厂时

^① 许涤新著：《官僚资本论》，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5页。

曾获得湖北存漕官机折銀25万两充作官股；两江总督張之洞曾为他申請过免税权；其本人申請过：凡在通州增設紗厂时，要向大生紗厂每包津貼一两，10年为期；1904年有人拟在崇明設厂时，清政府曾替他加以制止。根据这些情况，加之，張謇在清末是立宪派的首脑人物之一，在北洋政府时期又做过实业、工商、农林各部部长，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封建統治政权对張謇的庇护以及地方封建上层势力对他的支持。这就是張謇兴办各项企业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①实际上，大生紗厂从政权手中获得的某些特权并未完全实现。在清末，从封建政权手中取得資金融通、設厂和免税等特权的企业不止他一家。当时，清政府曾公布过各种专利权和机制品減免税厘的法令。大生紗厂虽然得到了封建政府的某些支持，但只是一般的联系，沒有成为大生紗厂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沒有和封建政权結合在一起，所以它不是靠封建政权庇护而生存的。大生紗厂与帝国主义更是沒有直接的依存关系。除了生产設備购自国外，在市場和原料方面，与帝国主义矛盾多，联系少；在資金方面，虽然曾向英国汇丰銀行借債180万元，但未因此出卖和丧失国家、企业主权，所以大生紗厂与帝国主义发生的某些联系，是屬於一般經濟範圍內的商业关系，它不是依靠帝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

事实上，早期的大生紗厂发展很快，其第一厂从开办到欧战期中，历年获利，最多一年曾达到53万元，相当于資本額的27%，主要是由于强化企业内部資本主义經營的結果，而不是靠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力量发展的。为了追求高额利潤張謇极力地改进企业經營，当时許多人认为大生紗厂的資本主义經營管理是比較健全的。由于不断地改进企业經營管理的結果，大大加强了对广大工人的剝削。有人說：大生紗厂的高額利潤“就是从延长劳动日和提高劳动强度两方面来剝削工人的”。^②張謇在强化企业内部資本主义經營方面，还可以举出下列一些事实：

首先，在原材料方面，通州一帶是棉花产区，棉花的产量較多，质量較好，大生紗厂可以就地采购。后来張謇自己又設立有恩殖公司，棉花可以自給一部分。这比上海各紗厂去外地采购棉花要节省不少人力和運費。

其次，在劳动力方面，通州一帶的劳动力比上海便宜，因为上海一地集中的企业較多，“工价因爭僱而日昂”。通州一地只有大生紗厂一家，別无分号，所以人工較賤。

第三，在产品成本方面，由于工价便宜，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銷售，可以免納不少厘金和捐稅，因之与一般紗厂棉花厘金要占貨值20%，棉紗外銷要納關稅5%相比，大生紗厂則是独操胜算的。在1903年前后，“上海各紗厂无不亏本，独大生办有成效”。

第四，在产品銷路方面，由于通州一帶是产棉区，土布織业很发达，自1895年土布織业开始參用机紗生产后，对棉紗需要日益增多，这給大生紗厂棉紗銷路帶來了有利条件。

由于大生紗厂是靠强化企业内部資本主义經營，即靠自己的資本增殖，而不是靠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力量发展自己的，所以是民族資本，而不是官僚資本。作为張謇主要經濟事业的大生紗厂既是民族資本性質，其本人当然也就是民族資產階級，而不是官僚資產階級。

对某些企业的性質和某些人的階級成分有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是由于对下列一些問題混淆不清所造成的。

① 彭雨新編：中国近代經濟史专题，武汉大学印，第67頁。

② 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二輯，上册，第41頁。

首先，划分阶级的标准问题。在学术界中有些同志往往从政治态度和政治地位来推断个人阶级成分和企业性质，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来划分阶级和阶层，这是马列主义一项基本原则。马克思曾指出：“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所得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那就是，工资劳动者，资本家，地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近代社会的三大阶级。”^①根据这个论点，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多少，是划分剥削阶级和非剥削阶级的标准；是否占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和占有多少，是划分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标准；根据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官僚资本理论的体会，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运用方式，是划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标准。凡是占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并依靠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力量来运用就是官僚资本，其所有人当然也是官僚资产阶级。虽然占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但不是依靠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力量来运用，而是靠强化企业内部资本主义经营发展自己的就是民族资本，其所有人当然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

虽然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划分标准是人民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占有和运用的经济关系，但是，经济决定政治，由于各阶级在经济上的根本利益不同，决定着他们不同的经济要求，而这个不同要求又集中表现在不同的政治态度上，所以在确定企业性质和个人阶级成分时，也应当和考察其本人的政治态度结合起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经营的企业与帝国主义，国家政权关系的性质，但不能以此作为确定企业性质和个人阶级成分的依据，这就是说，尽管是当权的大官僚，如果没有占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就不能划为官僚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是当权的大官僚，经营有现代企业，但不是依靠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力量，而是靠强化企业内部资本主义经营发展的，仍然是属于民族资本性质。虽然不是当权的大官僚，但其经营的现代企业是以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为依靠的，其企业性质仍然是官僚资本，其本人则是属于官僚资产阶级。但一般说来，官僚资本企业的所有人大部分都是当权的官僚。

上述事实说明，确定企业的性质和个人的阶级成分的标准，主要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占有和运用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地位，所以单是根据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地位来推断企业的性质和个人的阶级成分是不正确的。

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不能把划分阶级成分和对人们政治思想的评价^②完全等同起来。前面提到，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主要是根据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占有和运用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地位，而评价人们的政治思想除了要考虑阶级成分外，还要考虑其他许多因素。我们知道，阶级成分对人们的政治思想是有直接影响的，往往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有时候，人们的政治思想又不完全决定其阶级成分，因此评价人们的政治思想比划分人们的阶级成分要复杂得多，其中既要考虑阶级成分，又要考虑政治态度和其他方面等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企业资金来源和企业性质问题。在学术界中，有些同志认为：“官僚资本这个范畴，是指资本的所有者而言。”^③因此，把官僚投资的一切企业，不加区别的，都看成官僚

① 资本论，第三卷，第1159页。

② 评价人们的政治思想的标准问题，比较复杂，非本文研究的范围，故不详述。

③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1957年中国近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第53页。

資本性質，其所有人都是官僚資產階級，這是不正確的。我們知道，中國現代工業出現於19世紀60年代，首先是由清政府洋務派官僚利用國庫錢建立起來的，這是中國近代官僚資本的萌芽，其後又有許多官僚也開始投資於有利可圖的現代企業。早期的現代企業創辦人多為封建官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現代企業有許多是依賴於帝國主義對中國掠奪性貿易的，只有當權的官僚才能全面了解到帝國主義對中國掠奪的需要，在近水樓台情況下，他們多投資於現代企業是必然的；其次，在當時要創辦現代企業是很不容易的，要向外國購買各種器材和招聘技術人員，要向官府打交道，要了解市場上的需要等等，只有當權的官僚在這方面才具有便利條件；最後，要投資創辦現代企業，需要的資金也是很多的，在當時，封建官僚是社會財富的占有者，只有他們才具有創辦現代企業的實力。在這些有利條件下，當權的官僚多投資於現代企業，是不足為奇的。

但是，當權的封建官僚創辦的現代企業卻有兩種不同的發展趨勢：其中有些官僚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使企業經營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並直接投靠於帝國主義，因而發展成為官僚資本企業，其所有人也成為官僚資產階級。例如，清末的李鴻章、盛宣懷，北洋政府時期的梁士詒、周學熙，國民黨時期的四大家族經營的企業就是屬於這一類；也有些由官僚投資經營的現代企業，其生存和發展既未投靠於帝國主義，也未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而主要是靠強化企業內部資本主義經營發展成為民族資本企業的，其所有人也就成為民族資產階級。例如，清末的官僚朱鴻度、嚴信厚、楊宗濂等人和北洋政府時期的官僚張謇等人投資經營的企業就是屬於這一類的。這些事實說明，由官僚投資經營的現代企業，不一定就是官僚資本企業，其所有人當然也不一定就是官僚資產階級。歸根結底，企業的性質是決定於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運用方式，即企業經營與帝國主義、國家政權關係的性質，而不是決定於企業資金來源於何人。實際上，不是由官僚投資的企業，也有發展成為官僚資本企業的。可見，企業資金來源和企業性質是有區別的，不應混為一談。

第三，企業性質與國家政權關係問題。在學朮界中，有些同志一看到某些企業與國家政權發生了某些聯繫，不問性質，不進行具體分析，就認為企業經營是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的，具有官僚資本性質，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我們知道，在與國家政權關係方面，官僚資本企業與民族資本企業是有根本區別的。官僚資本企業重要特徵之一，就是與國家政權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其中官辦或國營企業則直接構成了反動政權的一部分；不論是官辦、國營或私人經營的官僚資本企業，都是直接構成了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官僚資本企業可以從國家政權手中獲得遞融資金，器材獨占，運輸優先，運費和捐稅減免，保證產品銷路等等，一般企業所享受不到的而為進行資本主義經營所必需的各种特權。這說明官僚資本企業經營，是以國家政權為依靠的。是與國家政權相依為命，共存共亡的。離開了國家政權的支持，就不能存在和發展。因此，在利害關係上，官僚資本企業與國家政權是一致的。

本來，資本主義國家初期在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為了加速資本主義發展，資產階級也曾利用過封建政權力量。但是，當資本主義獲得發展，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後，就反過來積極否定封建政權的存在，為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掃清道路。但是，中國近代官僚資本不同，它從始至終都是把自己的企業經營與封建性政權密切的結合在一起，在封建性政權羽翼下生存和發展的。許多官僚資本企業都具有兩重性質，是經濟和政權的合一機構，既從事經濟活

动，又拥有官府衙门的某些权力。例如，清末官办军事工业，黑龙江省各官办金矿局、四大家族经营的许多大公司都是如此。

民族资本企业与官僚资本企业不同，由于企业经营和镇压工人运动关系，虽然不得不和国家政权发生某些联系，但这只是一般的往来，它没有象官僚资本企业那样从国家政权手中获得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各项特权。所以它不是靠国家政权力量，而是靠强化企业内部资本主义经营发展自己的。某些较大的民族企业虽然有时可能从国家政权手中获得少许特权，但不构成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所以仍然是民族资本性质。事实上，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一直是反动政权掠夺的对象，它们之间是压迫和被压迫的矛盾，摆脱了反动政权的压迫和束缚，是民族资本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上述事实说明，在与国家政权关系方面，官僚资本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是根本不同的。前者与国家政权关系是相依为命，共存共亡，在利害关系上是一致的。后者不同，它不是依靠国家政权力量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事实说明，历代反动政权都是把民族资本作为掠夺对象的。所以在根本利益上，民族资本与国家政权是有矛盾的。

第四，企业性质与帝国主义关系问题。在学术界中，有些同志对官僚资本所具有的买办性和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所保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混淆不清，所以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理解的不全面。我们知道，许多经济落后国家在建立和发展大机器工业之初，往往都向资本主义强国购买各种器材，聘用技术人员，有时还借外债，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例如，美国、德国、日本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都是如此。但是，它们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往来，都是属于经济范围的商业关系，没有和政治发生直接联系。这些往来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双方是处于独立的平等的地位，不附有任何奴役性条件，因此没有丧失国家和企业主权，最后，这些国家都发展成为工业强国，变成了帝国主义。但是，中国情况不同，自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許多政治经济特权，反动统治阶级完全投入帝国主义怀抱，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经济发展极为落后，反动政府和官僚们创办的官僚资本企业，不论在器材、技术人员或资金方面，都是乞求帝国主义的。通过这些往来，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了中国内政，许多企业借款都是和要求中国经济主权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清末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铁路和汉冶萍公司的借款，除要求高额利息，酬劳金，不得提前偿还借款外，还要求有借款权、购料权、用人权、管理权、全部财产抵押权等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奴役性条件。当到国民党时更是如此，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企业向国外的借款，都是以出卖民族利益为条件的。例如，通过借款关系中国的许多重要矿产资源都被帝国主义所占有和掠夺。可见，帝国主义对官僚资本企业的借款，不仅仅是为了榨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单纯属于经济范围的商业关系，而且还附有許多政治条件的奴役性贷款。这种贷款的主要特点：贷款是与商品输出、原料掠夺、派遣技术人员结合在一起；贷款的高额利息压榨与不等价交换掠夺是结合在一起的；贷款与要求全部财产抵押权、借款垄断权、产品垄断权、企业经营权等国家经济主权是结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对官僚资本企业提供的技术设备，不仅价格很高，而且多是陈旧不堪，不能配套的。例如，清末时期，英国厂家对张之洞筹办的汉阳铁厂提供的技术设备，就是“残缺不全，缺漏尚多”。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帝国主义与四大家族的技朮合作也是附有种种奴役性条件的。例如，根据1937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和英国三家电器公司签订的技朮合同规定，除了供给各种技术设备、派遣技术人员“监督嗣后各项

出品之制造”外，还规定资源委员会生产的电器产品不得运销英国本土及其领属各地。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的买办活动更为加强了，不仅向美国大量借款，还和美国18家大公司签订了技术合作合同。“这18家公司都曾派人来华，勘察设计。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技术合作也是其中之一。通过技术合作可以了解被侵略国家的资源情况，打下经济掠夺的基础；通过技术合作，政治上可以到处渗入。资源委员会那时候和美国等垄断资本大规模进行技术合作，引狼入室，情况甚为严重。”^①可见，帝国主义的所谓技术合作和政治、经济侵略是结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对官僚资本企业派遣的技术人员，不仅索取高额薪金，横行霸道，不遵守中国法令，而且还控制了官僚资本企业的一切大权，进行特务活动，为本国提供政治、经济情报。清末时期，英国人马格里对李鸿章把持的金陵机器局、法国人日意格对左宗棠把持的福州船政局；国民党时期，美国人对四大家族企业的控制就是例子。帝国主义通过上述活动要求各种奴役性条件的目的就是为控制官僚资本企业的一切，使它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事实上，在帝国主义羽翼下的官僚资本企业，主要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例如，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生产的锑、钨、锡等矿产，都是直接运往美国的，四大家族经营的商业公司，也是直接贩卖美国商品的。这样，官僚资本企业就变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它离开了帝国主义支持，就寸步难行。直接依靠帝国主义生存，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这是官僚资本企业买办性的具体表现。官僚资本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是由其反动阶级本质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②由于官僚资本勾结帝国主义共同统治中国，所以它们在利害关系上是一致的，没有对抗性矛盾。

民族资本企业与官僚资本企业不同，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业生产很不发达，民族资本家在创办企业时，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国家购买机器设备、聘用技术人员，甚至借款，但这些往来与官僚资本企业不同，它基本上是单纯属于经济范围的商业关系，没有因此出卖民族利益，丧失企业主权，没有勾结帝国主义控制企业的一切，更没有达到离开帝国主义不能生存的地步。例如，规模较大的申新纺织公司因经营困难在1922年2月曾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350万日元，并以申新一、二、四厂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利息很高，年利是一分一厘半，日本企图通过贷款控制申新各厂，但由于荣家的抵制和及时偿还了借款本息，使日本蚕食鲸吞申新各厂的阴谋未能得逞。有些商业企业，虽然经营外国商品，但是，由于这些企业是靠自己的资本主义经营，而不是直接投靠外国资本；由于这些企业一般的不直接充当外国资本的经纪人，不拿洋行的佣金；由于这些企业一般的不是直接垄断和包销外国商品的进口和国内原料特产的出口贸易，不进行独家经营，同时又不是依靠国家政权进行经营的，所以这些商业企业是民族资本性质，而不是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企业与帝国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原因，不完全是决定于阶级本质，主要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的资本集中规律和趋向所决定的。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迅速膨胀起来的官僚资本已形成了巨大的强力垄断；另一方面又由于民族资本内部产生的集中，无论如何抵制不过外国资本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第4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页。

和官僚资本的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便自然的产生了某些企业对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依赖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民族资本企业要想不依赖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而维持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旧中国要想发展纯粹的独立的民族资本企业是根本办不到的。可见，民族资本企业与帝国主义发生联系，是不得已的事情。由于帝国主义极力打击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因此它们在根本利害关系上是有矛盾的，而这个矛盾又是对抗性质的。

关于官僚资本企业与民族资本企业的区别，毛泽东同志早已作了科学的论证。他指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①毛泽东同志这个科学结论，是我们判断民族资本企业与官僚资本企业根本区别的唯一根据。

第五，企业所有权和支配权问题。在学术界中，有些同志对在职官僚因职权关系支配了某些官僚资本企业，不问是否归其所有，一律把他们看成是官僚资产阶级，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对企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一般说来是统一的。归谁所有，就归谁所支配，反之，归谁支配，也就归谁所有。企业所有者（即投资人）虽然占有生产资料和工人创造的全部利润，但不一定直接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支配人（即无投资人）虽然代理所有人经营企业生产，但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工人创造的利润，却不归其所占有，他们是靠自己的薪金收入维持生活的，是资本家的代理人。但是，资本家和其代理人，究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马列主义的阶级学说，人们的阶级成分不能根据支配权作决定。这就是说，不能把在职官僚因职权关系支配了某些官僚资本企业，就把他们看成是官僚资产阶级。

从清末以来，历代反动政府经营的现代企业，都是属于官僚资本性质。因为这些企业经营都是以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为依靠的。反动政府经营的现代企业是属于官僚资本性质，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特有现象。历代反动政府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经营的企业，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多是由在职官僚所支配。但是，当企业支配人发生变化时，也往往会影响到企业性质，有时会削弱企业与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的结合关系，从而增强企业的资本主义因素和民族性格，逐步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清末湖北纺织官局和某些官办企业招商承办就是例子。当官僚资本企业改由职位更高或买办性更强的官僚把持时，往往也会增强企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使企业活动进一步地投靠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企业经营更加腐朽和反动。清末大买办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后，企业买办性的不断增强，最后变成买办企业，全心全意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就是例子。

实际上，官僚资本企业买办性和封建性的强弱和企业与帝国主义往来关系的性质和从国家政权手中获得的资本主义经营特权的多少，有着直接联系，而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的程度和经营特权的多少，又和企业所有人和支配人的官职和政治地位的高低，又是成正比例的。因此，当企业支配权发生变化时，对企业性质是有直接影响的。但是，不管官僚资本企业支配权发生什么变化，都不应当把企业支配人看成是官僚资产阶级，因为阶级的划分是根据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9—610页。

們对生产資料占有的經濟關係，而不是人們对生产資料的支配關係。

第六，企业中的官僚資本、外国資本和民族資本問題。在学术界中，有些同志把“……那些既非为官僚直接保有，又非为官僚所直接运用，但却显然在多方面受着官僚支配控制的那些私人企业資本”，^①和官僚資本企业中的商股（即民族資本），都看成是官僚資本，这是不正确的。我們知道，从清末以来特别是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企业，除利用国庫錢进行活动外，还大量的勾結外国資本和利用民族資本。尽管这些資本都是构成了官僚資本企业的資金来源，都是处于同一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都是同时参加企业資金周轉，共同組成为企业的資本总体，但在性質上仍然是有区别的。外国資本是官僚資本的后台老板，民族資本是官僚資本利用和掠夺的对象，所以不能把企业中的民族資本部分也看成是官僚資本。但是，这部分民族資本与一般民族資本又有所不同，它是在官僚資本直接卵翼下存在的。在企业經營方面，它往往是站在官僚資本立場說話的，借以維護自身的利益，因此，它和官僚資本的關係，比一般民族資本要密切得多。但是，由于民族資本被官僚資本用来为自己謀利，企业中的一切大权都是操之在官僚資本家手中，民族資本处于无权过問和被压迫的地位，所以在根本利害關係上，二者之間又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在同一企业中，严格区分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敌我，采取不同对策。毛澤东同志曾明确指出：“凡屬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厂、商店、銀行、倉庫、船舶、碼頭、鐵路、郵政、電報、電灯、電話、自来水和农場、牧場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經調查屬实者，当承認其所有权”。^②

总上所述，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虽然同是中国資產階級的組成部分，但二者之間是有区别的，划分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的根据，是人們对資本主义生产資料占有和运用方式。凡是占有資本主义生产資料，并靠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力量来运用就是官僚資本，反之，虽然占有資本主义生产資料，但不是靠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力量来运用，而是靠强化企业内部資本主义經營发展自己的就是民族資本。

但是，只是探討官僚資本的含义还不够，必須进一步明确官僚資本与官僚資本主义，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官僚資產階級的相互關係和区别問題。在学术界中，有些同志認為官僚資本和官僚資本主义、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是同一概念；还有些同志認為官僚資本的出現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是同时的，这些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它們之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面已經提到，凡是占有資本主义生产資料，并靠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力量来运用就是官僚資本。官僚資本主义就是官僚資本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資本主义性質的經濟体系。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則是由于官僚資本主义的发展，以銀行資本为中心的官僚資本壟断体系已經最后形成，与国家政权直接結合为一体，并在社会經濟中占据統治地位。在官僚資本萌芽初期，官僚資本家就开始出現，但作为一个階級來說，还没有最后形成。官僚資產階級是否已經初步形成，其重要标志应当有三个：首先、官僚資產階級已初步形成了一个集团，他們占有的資本主义生产資料是靠帝国主义和国家政权力量来运用的，仅有少数几个官僚資本家的出現还不能認為官僚資產階級已經形成；其次、官僚資本家是寄生階級，在社会生产中处于

① 王亚南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态研究，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66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四卷，第1459頁。

指揮地位，不参加劳动，他们通过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办法掠夺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使自己发财致富；最后，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已有了初步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在社会经济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根据这些论点来看，中国近代官僚资本虽然萌芽于清末，但经济力量很弱，封建性比较浓厚，还未能初步形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体系，所以没有发展成为官僚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萌芽的同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官僚资本家，但他们还没有从其他阶级中脱胎出来，他们的资本活动，还没有和封建性土地、典当、旧式钱庄、旧式商业和高利贷等分离开，对资本的运用还缺乏完整性和独立性，这说明官僚资本家的阶级成分不纯，没有初步形成一个名实相符的官僚资产阶级。同时，官僚资本家的人数有限，没有初步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还不十分明显，所以官僚资产阶级还没有最后形成。

当到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本有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力量有所壮大。例如，在全国煤矿（机械开采部分）中，官僚资本控制下的煤矿产量已占据垄断地位。在棉纺织业中，华新纺织企业集团已经形成，并在华商棉纺织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银行业中，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和南五行（中国、交通、上海商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等等银行团已经出现。同时，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结合已有发展。这些事实说明，官僚资本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官僚资本已经发展到官僚资本主义。由于官僚资本的发展，官僚资本家增加，许多人已基本上从其他阶级中脱胎出来，成为名实相符的官僚资本家，并初步地形成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如前面提到的，在纺织业特别是银行业中已出现了企业集团，为了升官发财，他们除了通过做官途径进行搜刮外，还大量的通过自己的官僚资本活动掠夺广大人民。官僚资本家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以进行公债投机业务为主的银行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已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事实说明，在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初步形成。

当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由于四大家族继承和发扬了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本的一切黑暗面，加之，在抗战胜利后，又劫收了庞大的敌伪产业，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发展到极高峰，形成巨大的金融资本，它控制着全国的一切经济命脉，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破坏作用和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说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得到空前的壮大，官僚资本更加腐朽和反动。

上述事实说明，官僚资本的出现不等于官僚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也不等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官僚资本家的出现更不等于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当官僚资本已初步形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体系时，官僚资本主义才会出现。官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在时间上又是一致的。中国近代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已初步形成了。但有些同志认为：中国近代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在四大家族出现之后才形成的。这种看法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